



燕山史志丛书

中国地方志论集

曹子西 赵庚奇 编

中国地方志论集

曹子西 赵庚奇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地方志论集

曹子西 赵庚奇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9.5 字数: 260千字

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5402—0189—4/K·0043

印数: 1—4,000册 定价: 5.80元

《燕山史志丛书》

主 编：曹子西

副主编：赵庚奇

王灿炽

《燕山史志丛书》缘起

曹子西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有长期编修地方志的历史传统。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编有地方志书和专业志书，其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各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变迁的资料，成为后人研究、借鉴和运用的宝贵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全国地方志小组，并在50年代末开展过一些修志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修志工作中断，直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编地方志工作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80年代，新编地方志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展开和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随着县情、市情、省情、国情调查研究、系统周密了解的需要，这项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兴旺起来。各级地方修志机构逐步建立与健全，修志专业人员队伍日益壮大和充实，并已陆续出版了数十种新编县志、市志和专志。

正是适应盛世修志新局面的出现，在中国地方志协会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于1987年增设了中国方志学系，第一届在籍学员即达三千来人。这些学员绝大多数来自编修新方志的第一线，还有一部分是县志、市志编纂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具有相当的写作能力，迫切需要学习、掌握编修地方志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为提高教学质量,组织好函授自学和辅导,聘请方志学教授、专家、学者撰写了一套适用于本专业大专水平的中国方志学函授教材。包括地方志重要文献选辑、地方志基本理论、中国方志发展史、县志市志专志编纂问题论集,以及地方志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等等。北京燕山出版社热心于新方志的编修和出版工作,现将这套教材中的部分撰著作为《燕山史志丛书》出版。今后仍拟随着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发展,选收有关方志理论研究和志稿总结评述等方面的论著。

1988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1. 要在必然联系上下功夫

- 试论新编地方志如何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甄炳昌(1)
- 2. 用初级阶段理论指导新县志的编纂杨高尚(14)
- 3. 方志的整体性及整体性的表述余奎元(21)
- 4. 强化总纂意识, 提高志书质量新宝峰(33)
- 5. 论地方志的主体意识金经天(39)
- 6. 论地方志的功能、属性及其特点林日恩(44)
- 7. 新方志体例的研讨汪自恒(50)
- 8. 略谈新方志的体例和结构问题翟永学(60)
- 9. 县志框架结构探微郭礼中(64)
- 10. 浅议志书的“贯通古今”问题杨俊科 梁 勇(68)
- 11. “概述”浅议阙金水(72)
- 12. 谈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质量标准孟范文(81)
- 13. 浅议生产力标准与新编地方志刘大文(86)
- 14. 新志书中必须记载改革吴廷鸾(93)
- 15. 轻重·详略·粗细
——关于方志编写的思考蔡 庭(99)
- 16. 志书要正确体现褒贬刘成友(110)
- 17. 方志六议于明恒(114)
- 18. 试论“比较法”在地方志中的运用吴炳顺(119)
- 19. 图、表、录在志书中的功能及其运用肖 怀(126)
- 20. 建置志的编写问题张 划(134)
- 21. 资料翔实、系统、准确是新方志的基础梁志强(142)

22. 关于资料的收集和应用·····	范南溟 (147)
23. 编纂地方志中的资料长编·····	袁廉章 (152)
24. 方志资料考证与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郝香琴 (156)
25. 论政治类专志的编写·····	廖盛时 (162)
26. 如何审查志稿的政治质量·····	逯全清 (176)
27. 发挥地方志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何兰平 (186)
28. 浅议方志的地方特色·····	张庆生 (191)
29. 关于编纂经济志的若干问题·····	任勋禄 (198)
30. 财政志质量的构思·····	崔起良 (205)
31. 科学技术志的交叉与重复·····	黄锦库 (212)
32. 地方志设自然环境志议·····	张孝忠 (219)
33. 关于撰写人事志的几个问题·····	王田青 (222)
34. 浅议人物志的时代性和实用性 ——评《石屏县志·人物》(征求意见稿)·····	杨 丰 (233)
35. 地方志人物传记写作初探·····	祝绍芬 (239)
36. 交通志篇目浅说·····	邓和平 (242)
37. 方志学与自然地理学的关系之我见·····	姚卓华 (248)
38. 全面记述, 突出特点·····	睢卯民 (254)
39. 风俗志如何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	杨文基 (259)
40. “记事”刍议·····	梁德元 (266)
41. 章学诚方志理论浅议·····	伍平章 (274)
42. 李泰棻与民国《阳原县志》·····	刘志河 (281)
43. 编辑地方年鉴是修志机构的重要任务·····	齐乃义 (288)
44. 谈地方志的信息作用·····	李文杰 (294)
后 记·····	(297)

要在必然联系上下功夫

——试论新编地方志如何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

甄炳昌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具有必然的指导意义。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当然不可能例外。我们要在吃透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根据方志工作的特殊性深入探索，从而把握这种必然的联系。笔者试图从这方面抛几块“砖”，以期引来专家与学者之“群玉”。

一、以科学反映国情为新方志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进一步校正修志工作的指导思想

1、正确认识国情，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根本重要性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并且，在这个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是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我国基本国情作出科学的概括；同时，这个理论又是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反复再认识的成果。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理解十三大精神的一把

钥匙，那末，正确认识国情，又是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把钥匙。因此，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无论是理解十三大的精神，或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民主革命阶段，开始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主要矛盾认识不清楚，以致在革命的路线、政策和策略上犯过右的和“左”的严重错误。后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特点和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根本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开始，对于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还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使“三大改造”等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可是，到50年代后期，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什么，在认识上严重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之风吹遍中国大地，结果遭受严重挫折，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经过调整后恢复了生机，但由于在认识上颠倒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10月重提阶级斗争，提出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置生产力于不顾的“基本路线”，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一次更大的挫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抚今追昔，无论是两次历史性飞跃还是建国后的两次严重挫折，都与对国情的认识是否正确有极大关系。国情关乎国策，国

策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对此，强调资政决策作用的新方志，难道还不值得自己深长思之吗？

2、社会主义新方志对正确认识国情负有特殊使命

这是由新方志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要了解一国的国情，离不开各地的地情；各省、市、县的地情，构成一国之国情。当然，从认识论来说，这不是简单的数量相加，还有通过综合分析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新方志应当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地方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按照这样的要求编好新方志，就能为正确认识各地的地情以至全国的国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地方志反映地情，不同于为介绍某一个地方或某项事业所编的概况或简介，也不同于某一个具体问题的调查报告或专题材料，而是要求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一个地方的基本面貌。为此，地方志记载地情，就不是鸡零狗碎，也不是有闻必录，而是要按照修志的目的和志书的功用，从一个地方的全局出发，去搜集、选择、使用那些最富地方特点、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资料，“志”出一个地方的基本面貌来。这样的新方志，自然是正确认识地情、国情的可靠根据。

地方志不仅反映静态地情，还要反映动态地情。拿一个地方行业来说，要反映建国以来的基本面貌，不仅要有反映发展变化的数据资料，还要由表及里地反映该行业在各个时期执行何种政策，产生何种结果；不仅反映该行业自身的发展变化，还要由此及彼地反映行业与行业之间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联系。这样的记述能够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自然也是正确认识地情、国情的最好材料。

编修新方志，各地成立了修志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为了

修好一地之志，必然要对该地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广泛深入、周密系统、规模巨大的调查。这是最好的地情、国情调查，是任何一项调查所不能代替的。因此说，新方志不仅对正确认识地情、国情负有特殊使命，而且能够胜任这个使命。

3、要自觉地把科学反映地情、国情作为新方志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正确的志观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灵魂。为什么修志？志书拿来什么用？历来方志学家争论不少。古人关于志书“资治、教化、存史”功用之说，基本为新方志所接受。然而，方志工作者在实践中着眼于为使新方志更具科学性和时代精神的探索，在“六字功用”说的前提下，却分化出各有侧重的不同功用观。有些人偏重于存史、资料，认为志书是“传世之作”，既为今人服务，更为后人所用，应该翔实地记载地情史料，一切用途可以由此服生；有些人偏重于资治、决策，认为历来志书为统治者服务，没有资治便没有志书，新方志理所当然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志书应重在知情、信息，以及由此提供的决策基础作用。

对修志目的及志书功用理解不同，反映在修志工作上便有不同的指导思想。一部地方志，根据各地不同的特点，一部专业志，根据各专业不同的特点，在内容上有所侧重，反映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这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但从修志工作的指导思想来说，要有一个正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避免走向极端，陷入偏颇。关于志书的存史、资料功用和资治、决策功用，新方志应在一个基点上把两者统一起来，这个基点就是为了正确认识地情和国情；科学地反映地情、国情，志书既有存史价值，更有资治价值。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用党的十三大精神进一步校正我们修志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十三大的理论、路线为准绳，努力科学地反映地情和国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正确反映建国以来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

人们常说，志书和史书不同，史书既记载史实，又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又史又论，论从史出；志书则是“述而不作”，要求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不必作者发议论，更要避免大褒大贬的宣传色彩。可是，志书也不是“唯无是非观”，不分真善美与假恶丑，把志述的内容变成一本糊涂帐。况且，要深刻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对该事物有一个正确认识。假如我们对被反映的事物陷入了盲目性，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它的本来面貌。作为“详今”而重点记述的建国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既有鲜花又有眼泪，既有成功经验又有失败教训，终于在认识上产生飞跃这样充满曲折与矛盾的历史。我们对这部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给了我们这部历史再认识的很好武器；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导编修地方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真学好这个理论，以此为指导，正确反映建国以来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要紧紧抓住对生产力和主要矛盾的分析 and 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落后，并且，由于生产力落后，必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不可避免的制约和影响。关于生产力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我们要通过认真学习，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深刻理解建国后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性质及其伟大成就。

1、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正确评价和记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历史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

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其后的22年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新方志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应该如实地记载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又是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初级阶段，这个基本特征必然从各方面反映出来；并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和部门，又必然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的志书，除了应避免“超阶段”的记述，还要根据实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很好地体现出来。

这个时期，我们对基本国情判断错误，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自觉其为初级阶段，用一种“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指导社会主义事业，以至产生严重的失误。例如：颠倒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生产力状况大搞“穷过渡”，“割私有制尾巴”，以及企图超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所采取各种“左”的政策等等。这些失误，不能不严重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所以，志书在记述各项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们放到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才能有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反映。这样一来，我们的志书就不能“报喜不报忧”，必须实事求是地既记述成绩与经验，又记述失误与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曲折过程。

2、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和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性质及其伟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大踏步前进，这是新方志需要大书特写的一段。因此，新方志反映这段历史面貌，首要的问题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改革的性质和目的，使我们的记述能立在一个正

确的基点上，通览全局，挥洒开去。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我国现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使之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状况，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这种改革的性质和目的，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所决定的。尽管在改革的探索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失误，遭受某种挫折，但在总体上不可能改变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这是我们在反映改革的基本面貌时应注意掌握的。

其次，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基准，去判明各项事业在改革中的是非曲直。新方志记述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现状，必然碰到许多是非功过问题，并且可能由于人们的思想矛盾和利益矛盾而把这些是非功过弄得非常复杂。志家秉笔直书，只能以生产力标准去判定。尤其要用生产力的标准，去对待那些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出现、并非资本主义特有、今天为发展生产力而兴办的事业；以及那些过去沿袭下来、并非社会主义制度固有、今天成为生产力发展障碍而被革除的东西。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深刻反映其面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处在摸索前进、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取得很大成绩，也碰到不少困难和矛盾。新方志如实地反映这段历史，应该采取“进行式”而不是“完成式”的记述。所谓“进行式”的记述，就是既记述改革带来的发展变化，也记述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既静态地记述各项事业改革的结果，也动态地记述各项事业在改革过程中的探索。这样，才能历史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基本面貌，为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三、深刻理解十三大关于“加快和深化改革” 的精神，大胆革新新编地方志工作

我们学习和贯彻十三大精神，要把握住改革这一基调，在各

项工作中大胆探索和开拓。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新方志，改革的任务比其他方面更加繁重和艰巨。因为在文化领域里，其他工作都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变革，唯独修志工作，自民国以来，出现了深长的“断层”，其理论和实践基本上保留着清末的原型。因此，更加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去开拓这古老的荒漠，使它能够结出丰硕的改革果实。

1、修志观念要更新

事业的改革，常常以观念的变革为先导。我们要对志体、志材、志法等方面作一番改革，必先对那些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束缚我们手脚的志观进行更新。有2,000多年历史的修志事业，老祖宗留下一份丰厚的遗产。对于这份遗产，我们当然不应该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批判地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要处理好修志的继承与创新关系，首先要鉴别一下，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修志观念，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过去虽合理可取，今天因时代不同已成“明日黄花”。建国后那些“左”的政治经济观、历史文化观和社会观等等，也会成为我们新编地方志的障碍，应该加以消除。

志书强调时代性，每一代志书，都打上它问世的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当今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新志书的时代精神，就是改革、开放精神。所以，我们的新志书，应该充分反映改革、开放的面貌，为改革、开放服务。这个新观念确立，对于更新旧志观念就有许多事情可做。例如，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是一种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城市极不发达，加之有浓厚的“重农抑商”传统，旧志反映这种经济社会内容，大都是重州县而轻都邑（城市），重山川而轻食货（经济），从《越绝书》到《大清一统志》，没有留下几部记载城市及其经济活动的志书就是一个明证。新方志为改革、开放服务，就要以浓墨重彩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的面貌，十分重视修好都市、城镇志，尤其

是悉心修好那些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活动中心的城市志书。并且，要把志书的重点放在经济门类上面，突出一个地方经济方面的特点，如实地记述它的正反经验，见微知著地提供发展的借鉴。这样一来，需要我们修志工作者认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生产社会化、现代化必由之路，摒弃迂腐的“重农抑商”传统思想，以及那些视商贾为铜臭，以讲金钱为卑鄙的封建士大夫观念。

拿广州市来说，由于历史上开放最早，地处南疆，毗邻港澳，直通海外，尤其中央很早给予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权限，设立经济开发区和经济改革综合试验区于前，使广州市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处于一种超前地位。虽然时间并不太长，但改革、开放使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步入八十年代后大放异彩！《广州市志》如果不能充分反映这段历史的面貌，将会因“失真”而大减其使用价值。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广州市志》的工作者不仅要有改革、开放观念，商品经济观念，还要有一种发展的超前观念，这样才能清醒地去搜集纵横线上那些能反映本质特征的有用之材，并加以精心制作。

更新修志观念，值得研究的是“志书功用社会化”问题。历来修志为统治者服务，过去志书的“六字功用”，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剥削阶级巩固其反动统治服务。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志书的实用价值甚微，更谈不上功用社会化。今天是人民治理的国家，“资治”自然与过去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并且，我们已认识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志书也不是拿来为“阶级斗争”服务，而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唯其如此，我们应赋予“六字功用”以新的内涵，朝着“志书功用社会化”的方向努力，变单纯的“资政”兼备“资工”、“资农”、“资贸”、“资文”、“资科技”；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说，还有“资衣”、“资食”、“资住”、“资行”等等。总之，要把志书从方志学家的书斋里和行政首长的案头上解放出来，使之走向社会，成为各条线上广大理论工